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现实基础 与路径选择*

李超 普友少

摘要:现代产业体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内各大区域板块中率先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在产业发展基础方面已经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正处于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的演化过程中。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其他国际一流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腹地和市场空间,更具竞争力的制造业成本优势和集群优势,但在产业结构层次和产业科技创新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重点围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海洋经济等领域,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比较;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3)04-0083-08 **收稿日期:**2023-05-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组织研究”(19ZD055)。

作者简介:李超,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 100006)。

普友少,男,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博士生(澳门 999078)。

经过工业革命以来的长足发展,湾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版图中最为重要的开放门户和空间载体,在引领时代发展潮流、推动全球生产方式变革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王宏彬,2014)。继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以及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和快速发展,必将进一步丰富湾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在对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的产业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①,深入总结国际一流湾区的产业发展经验,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一流湾区的产业演化历程

湾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先进产业和前沿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的过程。湾区既是所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一系列国家开放战略、新技术革命浪潮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支撑点(卢文彬,2018)。从历史阶段来看,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以及东京湾区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4—15世纪。在经历了17世纪以来的初步形成和快速发展后,三大湾区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步入成熟稳定期,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见表1)。

随着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美元逐步在全球确定了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纽约作为美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逐渐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纽约湾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湾区”。旧金山湾区抓住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时代机遇,凭借区内数十所世界著名大学、硅谷科技创新区等创新资源,以及从世界源源不断流入的高科技人才等优势,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和以风险投资为代表的金融产业得到迅猛发展,逐步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之一,并以“科技湾区”闻名于世。东京湾区在产业空间规划上采取集群发展模式,强调专业分工和错位发展,突破地域面积狭小和人地关系紧张等障碍,依靠其良好的重工业基础大力发展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制造业,其高新技术、精密制造、现代物流等产业均走在了世界前列,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湾区”(张燕,2021)。综合来看,纽约湾区、旧

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的产业结构特征目前已相对稳定,各类产业发展相对成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也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粤港澳大湾区由于经济发展起步较晚,整体上仍处于由“工业经济”到“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的演化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起,香港借助区位优势 and “窗口”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了从转口贸易向出口加工业的发展转型。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香港对外贸易总值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3.07%和19.13%。作为世界著名的自由港,香港迅速崛起成为举世公认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中心。1978年,党中央做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决策,得益于较好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前店后厂”的分工模式,珠三角地区在中国各大区域板块中率先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中;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快速崛起,在其后40年间创造了年均GDP增速超过20%的奇迹。2019年2月18日,《粤

表1 国际一流湾区的产业演化历程

湾区名称	阶段	时间	湾区产业发展特征
纽约湾区	初步形成	1812年至1929年	依托天然深水良港和跨国贸易优势,纽约逐步成为全美制造业中心和金融商贸中心;19世纪初开始,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相继进行工业革命和交通革命;19世纪中叶,以纽约为中心形成经济核心区;1929年提出跨越行政边界来建设有活力、宜居、可持续的城市社区
	快速发展	1929年至20世纪80年代	纽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制造业逐步外迁,以金融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1968年出台纽约湾区第二次区域规划,恢复区域公共交通体系,推动了纽瓦克等卫星城的快速发展,以纽约为核心的都市圈逐步形成
	成熟稳定	20世纪80年代至今	纽约及其周边城市成为跨国商业银行和其他跨国金融机构的集中地,实现了迈向后工业化时代的产业结构转型;纽约区域规划协会先后在1996年和2017年发布第三次和第四次区域规划,推动了湾区城市间合理分工格局的形成
旧金山湾区	初步形成	1848年至二战前	在“西进运动”和淘金移民热潮的带动下,城市化开始起步,重工业、轻工业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开始出现;20世纪20年代,旧金山湾区高速公路网修建完成,7座跨海大桥的建立使湾区城市网络雏形初现
	快速发展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	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以风险投资为特色的金融服务业迅速发展,旧金山西部金融中心地位确立;湾区内部出现郊区化现象,各大城市开始进行城市治理;链接旧金山与湾区其他城市的快速铁路网络系统(BART)建成
	成熟稳定	20世纪90年代至今	信息产业繁荣,新的零售业中心不断出现在湾区内,旧金山、奥克兰、圣何塞等三大城市分工定位明确;旧金山西部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奥克兰的港口和新兴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圣何塞依托硅谷成为科技创新中心
东京湾区	初步形成	1603年至二战前	东京逐渐成为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东京湾为中心建立水上运输体系和工业体系;东京湾周边开始填海造陆,东京港、横滨港、川崎港、千叶港、木津港等湾区港口功能逐步完善
	快速发展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	重化工业高速发展,形成京滨和京叶两大世界级工业带;实施工业分散战略,引导中心城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般制造业陆续迁移至湾区周边城市;建设轨道交通系统和环形放射状高速公路网
	成熟稳定	20世纪80年代至今	建立东京离岸金融市场,企业总部和高等院校集中,高新技术、精密制造、现代物流等优势产业集聚,东京新城的崛起带动科技园区发展;多核分散、职住平衡的一体化发展格局逐步形成

资料来源:卢文彬,《湾区经济:探索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刘彦平,《四大湾区影响力报告(2018):纽约·旧金山·东京·粤港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对外发布,明确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和空间布局,标志着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号角正式吹响。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板块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重要基地,正逐步由“世界工厂”向“全球制造业中心”转型升级(毛艳华等,2018)。在产业发展导向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坚持“四轮驱动”,即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柱,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以海洋经济为优势,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通过对四大湾区的产业演化历程比较发现,地域互不关联、要素禀赋差异显著的世界著名湾区,在产业演化过程中有着许多共性特征。一是湾区大多具备港阔水深的优良海港,发端于港口经济,并据此形成发达的临港型经济区和加工贸易网络,因港而生,依湾而兴。二是湾区都有明确的主导产业、先导产业和经济活动带,在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下不断实现产业和技术迭代,并引领相邻地区不断进行产业优化升级。三是湾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具有天然的开放属性、显著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是各类产业创新要素的汇聚之地。四是湾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需要协调区域内部产业、人才及资源的流动和配置,逐渐衍生出较为完备的区域协调和产业分工体系。

二、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一流湾区的产业 发展水平比较

通过比较四大湾区的基础数据可以发现,湾区已成为所在国家的主要人口集聚地和核心增长极。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分别以占全国7.2%、2.7%、28.8%和6.1%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0.0%、4.9%、40.6%和11.3%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四大湾区占所在国家国土面积的比重分别仅为0.4%、0.3%、9.7%和0.6%(方创琳等,2022)^②。综合来看,四大湾区都具有较大规模的经济体量、优势明显的产业集群、强有力的经济核心区、具有创新性的研发机构,正在逐步成为全球产业技术变革的中枢,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区域和国际经济的竞争格局。

1. 产业发展基础

从人口、土地、资本等要素禀赋条件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常住人口达到8634.52万人,土地总面积约为5.59万平方千米,远超其他三大湾区,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腹地和市场空间。在人力资本方面,粤港澳大湾区2020年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达21.43%,而其他三大湾区的高学历人口比例均已超过30%。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香港、深圳、广州等金融中心,吸引了70余家世界百强银行,银行总资产为纽约湾区的2倍左右,港交所和深交所IPO总额仅次于纽交所。2008—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两个证券交易所的证券市值占全球证券市场总额的比重从2.53%提升至8.12%。随着澳门证券交易所的顺利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将可能同时汇聚三大证券交易所,金融业发展潜力和资本的丰裕程度将会大大提升。

从要素价格水平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房价收入比要整体高于其他三大湾区,通过计算房屋抵押贷款占家庭可支配净收入的比例^③可以发现,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的主要城市均未超过85%,而香港、广州、深圳的该比值甚至接近300%。相对于房价收入比而言,广州、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同地段同户型的房租水平要显著低于其他三大湾区城市,甚至不到纽约的1/5。在通勤、饮食和服务领域的主要生活成本方面,粤港澳大湾区要显著低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这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家庭收入水平基本匹配。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的传统制造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随着未来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加快,粤港澳大湾区相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成本优势正在逐步消失。

通过进一步观察2005—2020年间各大湾区夜光指数的变化可以发现(见图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定基夜光指数高达139.2,纽约湾区为86.5,旧金山湾区为108.5,东京湾区为97.0,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活力和上升趋势遥居全球四大湾区之首。2021年,四大湾区均已突破1万亿美元GDP门槛。其中,纽约湾区为1.8万亿美元,旧金山湾区约1万亿美元,东京湾区为1.7万亿美元,粤港澳大湾区为1.67万亿美元。按照现有地区生产总值和相对增速推算,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赶超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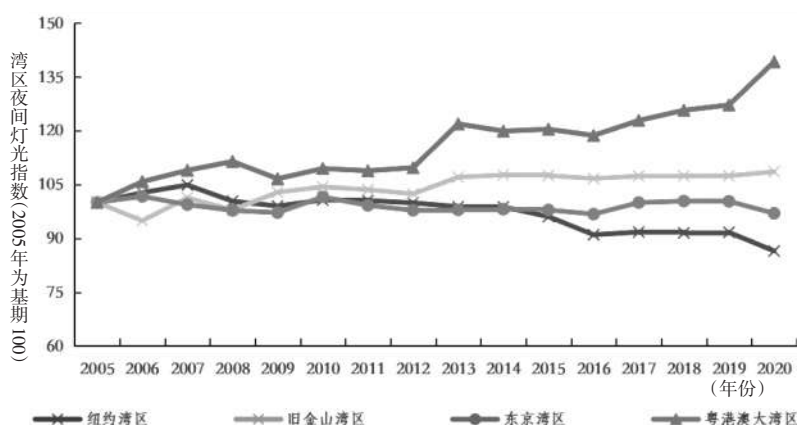


图1 2005—2020年四大湾区夜光指数定基变化趋势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招银理财、wind数据库整理计算。

三大湾区、跃居成为世界最大湾区经济体将是大概率事件。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机场客运量、进出口贸易总额、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等发展指标上,粤港澳大湾区均已超出纽约、旧金山和东京湾区的总和(廖明中,2020)。2021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有25家企业总部位于粤港澳大湾区,上榜企业总量已经超过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离东京湾区尚有一定差距。

2. 产业结构层次

从产业结构来看^④,粤港澳大湾区一方面展现出了与其他三个湾区相同的三二一产业结构(见图2)。第三产业占比最高,第二产业占比次之,第一产业占比均不足2%,且其占比持续下滑。但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也有着明显不同于其他三个湾区的产业结构特征。一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一

产业占比相对于其他三大湾区最高。2016—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一产业占比稳定在1.24%—1.48%之间,而最低的纽约湾区已常年不足0.1%。二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二产业占比要显著高于其他三大湾区。2011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二产业占比达到峰值的35.62%,同期第二高的纽约湾区只有19%,随后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二产业占比逐步回落至2020年的32.47%。作为中国制造的重点区域,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较高的第二产业占比依然会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特征。三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占比最低,并且呈先降后升的趋势。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6.4%,而其他三大湾区均在80%以上,占比最高的纽约湾区达到了92.5%。但总体来看,2005—2020年间,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占比大约下降了1%,而同期其他三个湾区占比均在上升,增幅最大的旧金山湾区提升了近3个百分点。

从制造业发展状况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成本、地理区位及政策等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积极吸收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培育出产业链完整、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成为了全球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与此同时,通过将产业价值链分布对标“微笑曲线”可

以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的生产环节优势主要集中在“微笑曲线”中段,而前后两端的研发与设计、营销与服务环节相对薄弱,产品的附加值较低,急需向两端延伸拓展(李超,2022)。这种价值链的分布状态也直接导致湾区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产业同构和过度竞争现象。有些产业规划与布局还欠合理,具有明显的行政区划特征,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日渐凸显。随着资源能源约束趋紧,一般要素价格上涨,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粤港澳大湾区的传统制造业面临日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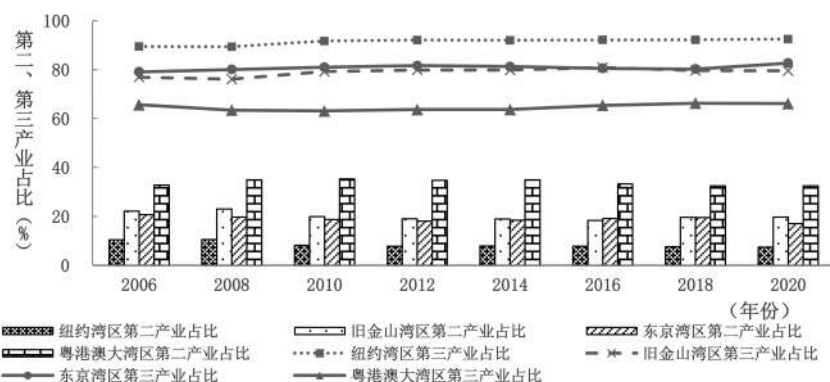


图2 2006—2020年四大湾区第二、第三产业占地区GDP的份额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公开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日本政府统计综合窗口(<https://www.e-stat.go.jp/>)、美国经济分析局(<https://www.bea.gov/>)、美国人口普查报告(<https://censusreporter.org/>)、大湾区广东九市统计年鉴(含统计公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https://www.censtatd.gov.hk/sc/>)、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https://www.dsec.gov.mo/zh-MO/>)。

严峻的转型压力。按照《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设定的预期目标,2025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将达到33%。但从目前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有一半以上的城市距离该目标尚有一定程度的差距。

从服务业细分行业份额变化来看,虽然粤港澳大湾区头部行业所占份额总量低于其他三个湾区,但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行业结构演化方向整体上与纽约湾区趋同(见图3)。粤港澳大湾区产值比重最高的三个行业所占地区GDP份额在35%左右浮动,而其他三个湾区的对应份额均在靠近或已越过40%基准线。综合来看,旧金山湾区头部细分行业份额不断扩大,信息业占比越来越高。东京湾区头部细分行业结构相对稳定、批发零售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湾区服务业头部细分行业都是金融保险业、房地产行业以及批发零售业,并且房地产业占比相对稳定,批发零售行业日渐式微,金融保险业占比则不断提升。十年间,以深圳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保险业发展迅速。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增至12.9%,而同期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该比例分别为18.7%、15%和10%。2022年,深圳已进入金融

中心指数榜全球前十,其保险业指数高居全球第一,而香港各项指数则常年高居前三,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业已具备一定的世界级影响力。但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城市服务业发展很不均衡,香港、澳门的服务业占比常年稳定在90%左右,而且以高端服务业为主。珠三角九市中广州、深圳和珠海服务业占比超过50%,其他六市服务业占比相对较低。从服务业的细分行业来看,珠三角占比最高的是批发零售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专业性服务业占比还相对较低。

3. 产业科技创新

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创新过程并不能完全解释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发现象,而是包含了各类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引导的结果。我国各区域的创新能力贡献主要源于各区域内企业主体的研究与开发投入,它们不仅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也是促进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发展对接的主体力量(郑国楠,2021)。

从产业研发投入看,国际上通常采用R&D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来反映地区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的研发投入(R&D)占GDP的比重,虽然相对于国内其他区域较高,但总体上仍低于其他三大湾区。根据欧盟

委员会《2020年欧盟产业研发投入记分牌》提供的2500家世界各国企业数据,旧金山湾区在企业研发投入和密度方面的表现均遥遥领先,共有56家企业进入研发投入榜前500名,全球榜单前十独占四位,包括Google母公司Alphabet、电子产品巨头Apple、社交公司Facebook(Meta)、芯片设计制造商Intel。旧金山湾区研发投入排名靠前的十家企业2019年研发投入总额为883亿欧元(见表2),占企业销售净额的14.10%,并创造了1505.6亿欧元的惊人利润。纽约湾区有14家企业进入研发投入榜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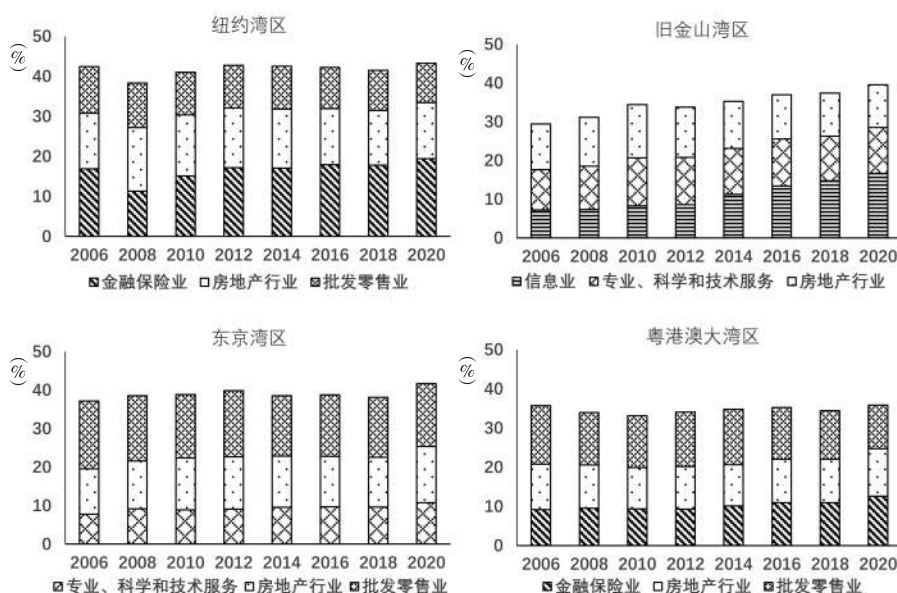


图3 2006—2020年四大湾区服务业头部行业占地区GDP的份额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公开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日本政府统计综合窗口(<https://www.e-stat.go.jp/>)、美国经济分析局(<https://www.bea.gov/>)、大湾区广东九市统计年鉴(含统计公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https://www.censtatd.gov.hk/sc/>)、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https://www.dsec.gov.mo/zh-MO/>)。

表2 2019年四大湾区研发投入前十的企业比较

湾区	研发投入 (百万欧元)	销售净额 (百万欧元)	研发投入 密度(%)	总利润 (百万欧元)	地区研发支出第一的公司
纽约湾区	38955.50	349308.39	11.15	72150.00	JOHNSON&JOHNSON
旧金山湾区	88309.61	626496.43	14.10	150555.48	ALPHABET
东京湾区	31309.19	552924.91	5.66	33137.50	HONDAMOTOR
粤港澳大湾区	27143.28	262442.89	10.34	32563.37	HUAWEIINVESTMENT&HOLDING

数据来源:欧盟官网(<https://op.europa.eu/en/home>)。

500名,医药企业Johnson & Johnson进入榜单前十,纽约湾区排名靠前的十家企业研发投入总额为389.56亿欧元,占企业销售净额的11.15%,合计利润为721.5亿欧元。东京湾区进入了榜单前500名的企业数量与旧金山湾区相似,但没有企业进入前十。排名靠前的十家企业研发投入总额为313亿欧元,占企业销售净额的比约为5.66%,总利润约为331亿欧元,均大幅低于旧金山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共有15家企业进入榜单前500,华为公司高居全球第三,大湾区研发投入前十的企业研发投入总额为271亿欧元,研发投入占比为10.34%,当年创造的总利润合计约为326亿欧元。整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研发投入实力目前在四大湾区中居于末位,但研发投入密度要高于东京湾区,仍落后于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

从产业创新产出来看,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GII)的数据,2011—2015年间,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通过WIPO一共提交了42888份国际专利申请(PCT)。2015—2019年间,该国际专利申请(PCT)数量上升至84326件,在总量上仅次于“东京—横滨”集群,长期位居创新集群榜第二位。在国际专利申请(PCT)增量及增幅指标上,“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均领先于其他三个湾区的创新集群。但从创新产出的密度看,“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每百万人的PCT申请量为1759件,约为“圣何塞—旧金山”创新集群的1/4,也显著低于“东京—横滨”集群,高于“纽约城”集群;每百万人的科学文章发表量则以2818篇位居四个集群最末,不足“圣何塞—旧金山”集群的1/5。根据国际风投研究机构CB Insights的数据(见表3),截至2023年6月,全球共有1218家独角兽企业,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分别有283家和129家,粤港澳大湾区仅有34家,从数量上要多于东京湾区,但与旧

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存在较大差距。

表3 2023年6月四大湾区内独角兽企业比较

湾区	湾区独角兽 企业数量(个)	国家独角兽 企业数量(个)	湾区占比 (%)
纽约湾区	129	657	19.63
旧金山湾区	283	657	43.07
东京湾区	5	6	83.33
粤港澳大湾区	34	179	18.99

数据来源:CB Insights官网,<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unicorn-companies>。

三、粤港澳大湾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 路径选择

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和苏蒂认为,后发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赶超存在两种“机会窗口”。一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成熟的技术体系下,后发国家和地区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实现经济追赶。二是在新技术革命的酝酿阶段,对新兴产业进行大规模的激进创新来实现技术赶超(贾根良,2013)。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以成本低廉的方式获得技术进步,从而在国内各大区域板块中率先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以“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牢牢把握住了“第一种机会窗口”。然而,在经济转型发展、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附加值正面临日益升高的劳动力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双重挤压。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如何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抢抓新技术革命的“第二种机会窗口”,将会成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需要肩负的重要使命与艰巨任务。

1.积极构建“总部经济+制造基地”现代产业布局

区域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一个内部经济发展协调的城市群可以使地理位置、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不同的各等级城市承担不同的经济功能,在区域范

围内实现单个城市无法达到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有利于形成资源互补、产业关联、梯度发展的区域价值链。因此,积极构建“总部经济+制造基地”的现代产业布局体系,可以在发挥“极化效应”的同时逐步发挥“扩散效应”,有效拓展各类生产要素的重组空间和配置效应,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从竞争走向合作”奠定良性互动的协同机制。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的战略关节点作用和运营总部密集优势,加快形成“A”字型产业空间布局形态,即东岸知识密集型产业带、西岸技术密集型产业带和沿海海洋经济产业带。加强核心城市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分工协作,大力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以及泛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深度,从而将“中心+外围”的空间布局转化为“总部经济+制造基地”的产业布局。

2. 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相对于其他国际一流湾区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规模优势、后发优势和集群优势是最为核心的产业竞争优势。未来应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产业融合和业态融合模式,在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绿色石化、电子信息、家用电器等传统重点优势产业领域,积极推动大湾区制造业智能化、规模化、品质化和绿色化发展。通过“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深度挖掘各类用户的品质需求,注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体验沟通,可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智造”转变。通过鼓励发展网络协同设计、众包设计、虚拟仿真、在线三维打印等工业互联网设计新模式、新技术来培育制造业新模式,大力推进工业软件成果的普及化、产业化运用,全面提升基于消费需求动态感知的研发、制造和产业组织能力。通过携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价值链,加快推进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不断突破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锁定,从而实现由组装代工环节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的整体攀升。

3. 以战略眼光大力提升全球高端要素集聚水平

未来世界的竞争将主要围绕创新资源和金融资本等高端要素展开。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深入推动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将是充

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一流湾区的核心要义。一方面,要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加快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加快推进国际化办学步伐、国际化人才培养力度和国际国际合作平台建设,鼓励高技术研发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到大湾区就业、创业和居住,努力搭建一个开放互通、中西共融的创新要素集聚区。利用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保持对现代服务业和高端人才的持续吸引力。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金融产品和制度创新,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为契机,大力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积极拓宽“跨境理财通”、FT账户等试点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和深度融合,探索大湾区企业居民资金往来同城结算,为港澳和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内地提供优质的中转后援服务。逐步探索推广风险投资理念,打造具有粤港澳大湾区特色的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开创知识产权与资本市场密切结合的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运营新模式。

4. 以前瞻性思维长远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先导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在全球价值链体系日益扩大的当今世界,按照传统的制造业构成比例来衡量国民财富的基础已不再成立,只有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才构成国家富裕的基础。因而要准确把握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态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比较优势,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一是以ABC技术(AI人工智能、Big Data大数据、Cloud Computing云计算)为重点,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一代通信技术、5G和移动互联网、北斗卫星、数字创意等重点领域实现弯道超车。二是以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为重点,在新型健康技术、蛋白类等生物医药、高端医学诊疗设备、基因检测、现代中医药、远程诊疗等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三是以高端装备制造为重点,在新型显示、智能机器人、3D打印、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高性能集成电路、轨道交通设备等领域实现集成创新。四是以节能环保技术为重点,在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以及核电、风电、光伏发电和输变电设备等领域加快形成集群优势。

注释

①由于全球存在大约58个体量不同的湾区经济体,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尽一致,且湾区概念本身存在一定的泛化现象。在众多湾区中,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历史较为悠久、发展最为成熟,具有较强的全球影响力,因此本文选取这三个湾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参照对象。若非特别说明,本文用四大湾区指代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②目前除了粤港澳大湾区和东京湾区的地域范围相对明确外,国内外学者和第三方机构对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在空间范围和统计口径上并未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标准。为此,本文主要基于官方或权威渠道对各大湾区的基础数据进行横向比较,部分指标由于数据缺失将统计口径调整至州级或市级层面。③数据来源:<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房屋抵押贷款占家庭可支配净收入的百分比,是指房屋贷款的实际每月还款额度与家庭可支配净收入的比率,假设90平方米的房屋(或公寓)100%抵押20年,其价格计算方法为每平方米市中心和市中心以外的住房平均价格;家庭可支配净收入定义为 $1.5 \times$ 每月净收入(假设女性收入为

50%)。④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第三产业使用了服务业宽口径定义。

参考文献

- [1]王宏彬.湾区经济与中国实践[J].中国经济报告,2014(11).
- [2]卢文彬.湾区经济:探索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3]张燕.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旧金山及东京国际一流湾区影响力比较[J].全球化,2021(4).
- [4]刘彦平.四大湾区影响力报告(2018):纽约·旧金山·东京·粤港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5]毛艳华,荣健欣.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与协同发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 [6]方创琳,王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超大城市群的特殊性与行动路径[J].城市与环境研究,2022(1).
- [7]廖明中.世界四大湾区要素资源流动现状特征分析[J].深圳社会科学,2020(6).
- [8]李超.在新起点上谱写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篇章[N].南方日报,2022-08-08.

The Realistic Basis and Path Choice of Constructing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i Chao Pu Youshao

Abstract: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fte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taken the lead in integrating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ystem among major regional sectors in China. It has a certain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erm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i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an “Industrial Economy” to a “Service Economy” and an “Innovation Economy”. Compared with other world-class bay areas such as the New York Bay Area,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nd the Tokyo Bay Area,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a broader development hinterland and market space, more competitive manufacturing cost advantages and cluster advantage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big gap in term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level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focus on areas such a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and marine economy,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Development Comparison; Path Choice
(责任编辑:平 萍)